

多變的世局與成長的學科

林碧炤

——紀念國際政治學六十週年——

國際政治學的發展到今年為止已有六十年的歷史。雖然論者們對於該學科的起源尚無定論，但一般皆認定，一九一九年在英國威爾斯大學所成立的國際政治系是該學科成爲單獨學系的開始^①。這個學科的創立實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戰爭的禍害空前慘重，激起英國學術界的反應，有識之士皆想利用學術研究，找出消弭之道。隨後，英美各大學亦設立了相同性質的學系，教學相長，蔚成風氣，成爲學術界的一股主流。客觀的說，今天的國際政治學已經是一門相當完整的學科。過去大學講堂裏時常討論的一個問題——國際政治學能否成爲一門科學？已經不再受到重視，因爲最近的研究已證明上述的問題是次要的。又如，一九六六年英國的著名學者馬丁·懷特曾經說過：「國際關係的理論不但很稀少，而且患了學術和道德貧瘠的毛病」^②。這句話無疑是指：國際政治學的哲學理論與政治學的哲學理論，無法相比，因爲後者不但擁有浩瀚之著作，且有各種學派，例如，帕拉圖、亞里斯多德、洛克、孟德斯鳩、穆勒等，是國際政治學所不能及的。雖然如此，最近二十年以來，國際政治學的分工，已比以前精細，研究的方法更爲新穎，而理論的基礎亦更爲堅固。今天我們所討論到的問題如能源危機、限武談判、外交計劃、南北對抗、太空合作等，都是六〇年代所未討論過，或者是不太注意的課題。而學者們所使用的系統分析、遊戲理論、嚇阻理論，亦是長期努力的結果。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很扼要地介紹這個學科的發展過程，並討論幾種主要學派的主張。

註① Brian Porter, ed. *The Aberystwyth Pap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7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61-369.
註② 這句話的原意是：「International theory is marked not only by paucity but also by intellectual and moral poverty.」

國際政治學的第一個階段通常被稱為理論主義對實際主義的時期^③。爲了明白這個時期的主要特性，首先必須討論這個學科的起源。在早期，國際政治學是一門新創的學科，學者們在肯定自我價值和奠定研究的基礎各方面，曾遭遇不少困難。以歷史、哲學和法律來說，這些學科在一九一九年已有規模，從事研究的人不必爲研究的方法和通則費神。可是，國際政治學在一九一九年是新設，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解釋的通則和資料的收集，都必須從頭做起。因爲歷史和法律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國際政治學者很自然地參照這些學科，做爲他們的指引。其結果是，早期的國際政治學不是討論外交史，就是涉及國際法的問題，而所謂的國際政治學家根本就是歷史學家或者是法律學家。以威爾斯大學的國際政治系第一位系主任吉門教授(Alfred Zimmer)爲例，他就主張國際政治不可能成爲單獨的學科，必須融合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及其他相關學科，來研究具有國際性質的問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之間，英美學者大部份持這種觀點，認爲國際政治學者不宜以太偏窄的觀點來分析問題。事實上，他們也認爲國際政治學不可能摒棄其他有關的學科，而單獨存在。

此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當時的研究受到戰爭後遺症很深的影響，所以大家希望從學術的途徑，找出可行之道來建立一種較爲穩定的國際秩序。基於這種要求，外交史也就成爲研究的重點，因爲鑑往知來仍然是大家堅信的治學原則。同時，代表着國際和平所希望的國際聯盟，亦是學者間注意的焦點。以威爾斯大學來說，國際政治系主任同時冠以「烏得婁，威爾遜教授」的頭銜^④，這無疑是表示當時學術界對於這一位美國總統的敬意，亦代表它們對國際聯盟的期望。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國際聯盟與法治(吉門教授所著)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之一，其他的重要著作尚有：奚得利教授的外交與國際關係之研究(一九一九年出版)和白萊斯教授的國際關係(一九二二年出版)^⑤。除了這些著作之外，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和美國的國際關係委員會亦隨之成立，推動國際政治的研究。前者發行國際事務季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後者出版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至今仍是具有相當權威的刊物。其他的重要組織，例如，卡內基基金會、世界和平基金會及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亦舉辦學術討論會和推動各項研究。

註③ 廖中和，「國際政治的理想主義」、「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刊載於幼獅月刊，六十五年一月及三月號。

註④ Dougherty, J. E. and R. L. Pfaltzgra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1), Chapter I.

註⑤ 以威爾遜總統之名來稱呼國際政治系的教授，是對於這位政治家的尊敬，同時，對於享有這位頭銜的人，也是一種殊榮。

註⑥ 這些書目前只作爲參考之用。對於研究早期的國際關係，它們還是具有很高的價值。國際政治學畢竟和數學不一樣，唸數學的人看了新數學之後，不必再讀從前的數學，可是學政治學的人，在今天還是要讀帕拉圖的共和國，雖然行爲政治學已經很盛行。

我們從外交史已經得知，國聯最後遭到瓦解的惡運。國聯的失敗以及隨後法西斯極權政權在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的出現，曾造成世局的混亂，亦使得當時研究國際政治諸人極爲失望。在這種情形之下，重新檢討研究方法和方向似乎是必要的。經過一番爭論之後，新起的學者嚴厲批評前人研究的不當。雖然，以前的學者們曾就國際法、外交史和政治學，整理出一套解釋國際政治行爲的規則，但被批評爲太膚淺，因爲他們只不過把已知的知識加以整理而已。再者，他們對於許多國際問題的見解，缺乏深刻的剖析，通常只是表示了作者個人的期望。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十五年之間的研究當中，我們發現當時對於和平、道德、理性，寄望過高，因而忽略了決定國家行爲的現實因素。以吉門教授所著的國際聯盟與法治一書爲例，全書共分三大部份，一爲分析戰前的制度，二爲檢討國聯的組織，三爲觀望未來，字裏行間充滿着對戰爭的譴責，批評國際無政府狀態，同時對法律與國聯制度寄予厚望。

這種研究的態度被批評爲「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代之而起的則是實際主義^⑥。因爲前者關心未來，強調理想、認爲現狀可以被改變；後者則重視現實，認爲必須先了解現狀，然後再討論改變現狀的方法。什麼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依照實際主義者的見解，權力是構成國際關係的本質，那麼研究這門學科也應以此爲中心。這也就如同馬奇維里所說：「就我而言，觀察現實總比想像要來得適當」^⑦。在此大前提之下，國際政治的研究有了新的轉變，研究的重點在於觀察國家如何追求權力，如何利用權力來達成政策所擬定的目標。在這種研究目標之下，歷史和法律仍然受到重視，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態度來解釋國家的行爲。以著作而言，英籍卡爾教授的「二十年代的危機」，可以說是這個學派的先鋒之作。以後，許多名著相繼問世，重要的有史瓦任博格的「權力政治」，懷特的「權力政治」，巴特斐的「基督教外交與戰爭」（以上三人爲英籍），史派克曼的「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策略」，尼伯爾的「善惡之間」，莫根索的「國際政治」，肯楠的「美國外交」，伍爾佛斯的「爭執和合作」，史特勞斯—胡貝的「權力和社羣」以及季辛吉的「一個重整的世界——拿破崙以後的歐洲」（以上七人爲美籍）^⑧。

實際主義學派對於二次大戰後國際政治的研究，影響很深。在教學方面，以上所列各書皆爲主要之教本，不過莫根索的「國際政治」，對研究國際政治者而言，幾乎是人手一冊。在政府決策方面，肯楠、季辛吉以及其他人士對於美國外交政策曾有主宰之力。在學術方面，各家學者對於歷史和國際關係的不同解釋，更進一步激發了研究的興趣。史派克曼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尼伯爾和巴特斐從基督教悲觀主義的立場，肯楠從道德主義的觀點，莫根索從韋伯的社會學，季辛吉從歐洲史，爲複雜的國際政治提

註⑥ 關於此點，參閱廖中和前揭書，另外，E. H. Carr. *The Twenty-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emilian, 1939).

註⑦ 這句話的原文是：「It appears to me more proper to go to the real truth of the matter than to its imagination.」

註⑧ 關中，「美國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學派簡介」，政治學報，六十五年十二月。

供了解釋的原則，同時，亦留下許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權力是否為唯一的解釋國際政治的準則？國家是否為國際政治的唯一主體？新興國家的產生以及科技所帶來的變化是否可以用舊有的觀念去解釋？學者們對於這些問題仍在爭執之中。無論如何，實際主義在確定國際政治的研究方向，縮短理論和事實的差距兩方面，確有重大的貢獻。

當然，由於二次大戰後國際情勢的轉變，理想主義和實際主義並不能完全符合實際的需要。我們舉出下列的事實：(一)歐洲國家的式微(二)美蘇的對立(三)亞非國家的獨立(四)區域經濟的合作(五)安全和同盟組織的成立(六)國家之間接觸面的擴大，來說明戰前與戰後的轉變。在過去，戰爭與和平是兩個很明顯的不同時期，當然各國亦對之採取不同的政策；但是，在二次大戰之後，和平與戰爭幾乎是很難分出界線。因此，我們可以見到，美蘇二國在平時所推行的却是過去戰時所做的，例如，軍事計劃、動員、外援、宣傳等。國家的數目增多，接觸面更廣，問題更複雜，使得國際社會的本質發生變化，也迫使各國必須以更積極和更警覺的態度來應付國際問題。爲了滿足這些需求，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有了幾種新的改變^②：(一)世界各大學及學院所設的國際政治系愈來愈多。(二)專門研究國際政治、軍事問題、戰略安全的機構日益增加，例如英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所，美國的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等。(三)區域研究受到重視，例如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八個區域研究所，英國倫敦大學及牛津大學亦設立了相同性質的研究所，其中最著名的是東亞研究所、蘇俄及東歐研究所、中東研究所。非洲研究則在六〇年代以後隨着非洲獨立風潮變得更要，日本研究亦因爲日本的經濟成就而受到重視。(四)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更爲分歧，這種現象在美國學術界尤其明顯。

三

這些現象同時亦反映在學術著作上。從坊間的各種有關國際政治的書本中，我們可見研究的對象愈來愈廣，方法亦愈來愈多。系統理論，遊戲理論，心理學，數學，社會學幾乎全用在國際政治的研究方面。對此，哥倫比亞大學的福克斯(W. T. R. Fox)曾有如此的評語：「國際關係的學者們總覺得，他們如果能賣弄一些別人所難以了解或估量的命題或見解，在心理上較不會有自卑感」^③。這種現象似乎是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社會科學發展的新趨勢。以往的社會科學家，特別是政治學家，太重視制度和組織，使得真正的人類的社會及政治活動無法充分地被了解。此外，研究的人往往持有個人的價值判斷，因而其提出的解釋太武斷。爲了使得解釋更合理，判斷更確實，社會科學家也就借用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學上，這些表現在民意調查、選舉行爲、政治功能、決策過程等的研究方面；在國際政治學上，有關聯盟體系、軍事安全、國家行爲和政策制度，也有了新的方法。

註^② W. T. R. Fox, *The American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68), pp. 15-17.

註^③ 福克斯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政治教授。他的話之原文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would feel less inferior if he had a body of propositions as difficult for his colleagues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as some of theirs are for him.」

在這方面，比較著名的是希林(Thomas Schelling)，包卜(Kenneth Boulding)，杜許(Kare Deutsch)，萊克(William Riker)，理查遜(Lewis Richardson)，默德斯基(George Modelski)，默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和凱布蘭(Morton Kaplan)。

雖然上述諸位學者曾經下了很深的功夫，他們的著作也有相當的份量，但其研究的方法並不為其他的學者所接受。最先公開發難的是英國的波耳教授。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在倫敦大學所舉辦的「國際政治學教育年會」上發表了一篇以「國際理論：一項傳統的研究法」為題的論文。隨後，該論文刊登於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四月號^⑥。文中所談到的約有如下各點：(一)國際政治是一門成長中的學科，因此它必須從社會科學中已經發展的學科例如哲學、歷史，求取研究的方法。國際政治學者如果太重視科學的證明，而不專心於政治的主題，顯然是本末倒置。(二)所謂的科學研究法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大部份是經由傳統的方法達成的。(三)科學研究法所遭遇的困難——無法進行的實驗，繁複的變數和多變的國際情勢，使得這種研究法無法進一步推展，其結果是學者們只發明了一些名詞來解釋已知的國際關係。(四)「模式」的濫用，對於有關國際政治理論的建立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害。(五)盲目地使用統計、數學、測量，使得許多見解發生錯誤，因為學者們爲了統計和計算的方便，必定會忽略許多相關而又不能計算的因素。(六)過分重視科學研究法而摒棄歷史和哲學，使得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喪失了自我批評的工具，其研究的結果會顯得不夠成熟。

代表科學研究學派的凱布蘭立即反擊波耳，指責傳統學派不了解科學學派的本質。他的文章——「新的大辯論：國際關係的傳統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刊登於「世界政治」一九六六年十月號^⑦。他很直接了當地批評傳統學派把科學的目的和方法混爲一談。科學的研究在於了解自然和人文的活動過程，而其目的却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爲了實用，有的是爲了理論的澄清。以國際政治學來說，它的目的在於研究如何維持和平，減少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在此大原則之下，學者對於何種性質的國際社會較爲適當，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就表現了個人的價值判斷；但是摒棄這些主觀的價值判斷，而以客觀的科學方法去了解國際政治的實際情況，實屬必要。根據科學的成長經驗，一些經由觀察或直覺而提出的假設和命題，經過驗證之後，得到了理論，再以此解釋現象；現象有了改變，再提出新的命題，再加驗證。這是物理、生物或者其他科學的發展過程。國際政治學是否能完全照這個方法，發展成爲完整的學科，正是科學派的努力方向。但對科學派的這一番摸索和策劃，傳統學派非但沒有表示贊許，反而提出尖刻的批評，以致凱布蘭在他的文章中大表不滿：

「傳統派的學者們根本不了解新派(科學派)的主張和方法……他們並未澄清方法上的重大爭論問題，反而使得它更混雜。

註⑥ 張京育，「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的爭論」，政大學報，二十九期(六十三年五月)。該文對科學派及傳統派之爭，有深入之分析。

註⑦ 凱布蘭教授稱科學派與傳統派之爭爲大辯論。事實上，這場爭論並沒有他想像中的熱烈。

他們把簡潔、明瞭的分析架構誤認為教條式的申論；他們把那些經由各種模式的分析架構而得到的論點誤認為描述開放世界的泛泛之言……傳統派的學者都是精明之士，他們為什麼會犯這種錯誤？」^⑬

持平而論，傳統派與科學派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以前者而言，本來國際政治的起源就和歐洲近代史脫離不了關係，為了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有關國際法、外交史、國際關係的問題都會被討論過，所得到的成果亦是很豐碩的。以莫根索的國際政治一書為例，作者討論了國際利益、權力平衡、國際和平及安全等問題，參考了許多歷史上的例證。傳統派的長處就是在於使用歷史的資料，很有條理地解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行為模式。不過，在這些解釋當中，有許多名詞及觀念並不很恰當。有些因為相沿成習，大家不再細究它們的適用性。例如，國家利益是學者及決策者經常使用的名詞，但是，它的定義並不很清楚，若以國家的政策目標代替，則顯得更為明確。又如，權力平衡是常見的名詞，但是有關平衡的觀念要溯自經濟學、社會學、甚至物理學^⑭。這種擺脫舊有的研究門徑，找尋新的方法，來澄清已知的名詞和重新解釋國際關係，正是科學派所進行的工作。

四

波耳教授與凱布蘭教授的爭論並未擴大，而所謂的「傳統主義對抗科學主義」的大辯論似乎也是雷聲大雨點小。有人認為，支持傳統學派的諸人皆為英籍，原因是英國國際地位的衰微，連帶地影響到它的學術地位，造成傳統派勢弱^⑮。英國學者間重視歷史固然是事實，但是支持科學派的亦大有人在；再者，傳統派亦不只限於英國學者，美籍學者亦有很多人以此法治學。所以，純粹以國家或地區的理由來說明傳統派和科學派的息爭並不是完全正確的。經過十多年以來的觀察，西方學者已經發現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二派都各有變化，以適應國際社會的轉變。在科學派與傳統派的爭論之後，國際政治學界出現的是一羣社會科學家，他們所用的研究方法比前人所用的更新；同時，他們亦盡量設法縮短理論和事實的距離，使得他們的研究成果能更實際。換言之，傳統派已經逐漸承認科學派的地位，而後者亦隨時改進它們的研究方法，以配合實際的需要。對於此種發展方向，阿格（Cladwick Alger）在一九六八年的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曾有如此的評論：「在最近的將來，國際關係的研究之受到二十世紀社會科學革命的影響要比過去更為明顯，一項單獨的國際關係理論可能無法發展出來，不過它將是一種廣泛的科際理論架構的一部份，它亦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分支學科發生關係」。^⑯

註^⑬ 原文太長，不便載出。讀者可參見「世界政治」十月號，二十頁。

註^⑭ 關於權力平衡的觀念，克勞德所著之權力與國際關係，可供參考，臺北幼獅書局出有中譯本。

註^⑮ Stephen George, *Reconciling the Classical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London), Spring 1976.

註^⑯ 原文登於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一九六八年，第八冊，六七頁。

從今天國際政治學的發展結果來看，這個預測是正確的。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已經成爲一項多邊的學科，包含了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的主要概念，而其研究的方法亦與數學脫離不了關係。我們只要比較莫根索的「國際政治」和杜許的「國際關係的分析」，便可明白這個學科的發展情況。莫氏的巨著在一九四八年問世，隨後再版七次。此書討論的問題很多，不過主要的還是一些有關權力、安全、道德、法律與組織的問題。杜許的書於一九六八年初版發行，一九七八年再版。他的着眼點顯然和莫氏大不相同。他所討論的主題計有：(一)國家與世界(二)超國過程和國際互賴(三)戰爭與和平(四)權力和弱勢(五)國際政治與國際社會(六)世界人口對抗糧食、資源與自然環境(七)財富與貧窮(八)自由與破壞(九)認知與幻想(十)主動與冷漠(十一)革命與安定(十二)本體與改變^①。

劉覽杜許的著作之餘，吾人難免會懷疑，國際政治是否已經走了樣？所謂的「本體與改變」，「認知與幻想」，「主動與冷漠」代表何種意義？作者是否玩弄名詞的遊戲，把本已複雜的國際關係弄得更難了解？事實上，這是學術界對於國際社會本質之轉變的合理反應。因爲現在的國際社會受到科技、經濟和軍事的影响，起了變化，研究的人也相對地調整了他們的研究方向。過去的主要強國，往往可以毫無約束的使用武力，以達成政策目標，現在的國家並沒有如此方便。從前的帝國主義爲了通商可以派軍艦、用大砲打開通商之門，現在則必須使用談判及其他外交的手段。又如從前國家與國家之間，界限森嚴，人民之間來往不易。但在今天的西歐，國界所樹立的壁壘已經不如從前的森嚴。一種所謂「歐洲共屬感」逐漸地興起，而且很巧妙地配合每一個國家所特有的民族意識，推動各國發展政治與經濟合作。與此有關的是國際社會所要解決的問題，日益複雜，諸如石油、水力、交通、郵電、糧食甚至於社會福利等各種問題，已經和過去大家所重視的軍事、安全、地理一樣重要，各國非更加合作不可。而在這些問題上，有很多重要的決策者並非政府，而是超越國界的所謂「多國公司」。現在西歐各國均欲以法律和政治的途徑來約束它們的商業行爲，但是應該如何實行，顯然不是傳統的外交觀念可以應付得了的。此外，在軍事上，人們的觀念亦有改變。過去歷史的實例告訴我們，國家的軍事力量增加，它就享有優勢，亦就可以自由行事，隨心所欲。今天因爲核子武器的破壞力太可怕，軍事強國的行動自由，連帶的受到約束。强大如美國者今天面對伊朗暴徒佔據其使館，劫持其外交人員而竟一籌莫展，便是明證。

面對此一情勢，學者們在研究的分類上，大約是朝着三個主要的方向：一是理論方面，二是各國外交政策方面，三是個別的專題研究。在這三項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第一項。在六〇年代，科學派與傳統派相陳並列，在七〇年代，有關理論的研究進入所謂「後行爲主義」的時代。關於「後行爲主義」的意義，美國政治學泰斗大衛·伊士頓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美國政治科學學會第

註① 杜許教授所提的某些問題可能使人誤解，茲附上原文：②Transnational proces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③Power and weakness

④Perception and illusion ⑤Activity and apathy ⑥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 其他的問題的名稱則比較清楚，原文省略。杜許教授的書（一九六八年版本）幼獅書局有中譯本。

六屆年會上的演講，曾有詳細說明。全文隨後載於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號^⑧。伊士頓列出七大項，說明「後行為主義」的基本信念。其中與國際政治有關的計有五項：(一)行為科學在以前只限於事實的分析與記述，後行為主義則尋求更廣大的內涵。(二)行為主義重視方法，後行為主義則以內容為先，方法為後。(三)行為主義之研究重點為現象分析，與現實政治脫節；後行為主義則面對現實，對於不良的政治現象加以批判。(四)行為主義宣稱對於價值中立，而後行為主義則觀察價值。(五)行為科學強調研究之方法要與目的分開，後行為主義則兼顧方法與目的。

就國際政治的研究來講，後行為主義顯然有助於這個學科的發展^⑨。在六〇年代，當科學派人士孜孜於鑽研新的研究法之時，很多人批評他們根本不是研究國際政治，而是在搬弄名詞和方法論的遊戲。他們過份重視研究方法與技術會使得初學者無法了解其中奧妙，進而造成研究理論的雜亂無章。如遊戲理論提出之時就牽涉到數學。初學國際政治的人一接觸到這種理論，定會認為這根本是或然率和排列組合的問題，與國際政治很難發生關係。又如凱布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過程」剛提出來之時，反對人士便指責他所主張的六個系統根本是把已知的國際關係加以重新組合而已。由於當時的新派人士皆主張「寧願錯誤亦不要模糊不清」(It is better to be wrong than vague)，他們當然專心於方法上的討論。所幸後行為主義的興起，已使從前那種過份重視方法的毛病得到了補救。今天的國際政治學者對於系統的觀念已有很高的評價，因為它所提供的解釋架構，的確是其他社會科學的觀念所做不到的。他們對於遊戲理論之適用於解釋二國之間的衝突，以及政府的政策制定，亦表贊可。

在研究外交政策及各種專題方面，七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成就亦是很明顯的。學者們不但對於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的政策制定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對於閉鎖的共產國家的外交政策亦曾做深入的研究。共產國家固然不像西方國家一樣，公佈它們的官方紀錄，但是它們的報紙、廣播、書刊及其他刊物提供了不少的資料。學者們運用不同的方法，解釋這些資料，也得到了若干的基本了解。今天蘇俄及中共的外交人事和政策方向已經不再是陌生的課題。同樣地，許多亞非國家的外交政策亦成為研究的對象，印度、奈及利亞、迦納、印尼等國的外交政策早有專書出版，對於了解新興國家的決策過程，實有莫大的幫助。至於專題方面的研究，國際統合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西歐的共同市場，北歐的經濟合作，加勒比海地區的合作都是學者們關心的問題。其次，嚇阻理論和核子武器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亦是相當重要的問題。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文人研究戰略的成果，特別是在美國，已有相當好的成績。這對於協助政府應付任何國際危機，也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國際政治學是一門成長中的學科，所以它將來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有人認為，世局如此險惡，而國際政治學者似乎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那麼這個學科到底有何價值？在回答這個問題之時，我們必須強調，世局固然多變，但是這並不能否定

註^⑧ 除了該刊物之外，高希均，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學生書局印行，可供參考。

註^⑨ Dougherty, J. E. & R. L. Palitzgraf, 前揭書第十三章。

國際政治學的價值。同樣的情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感染到的疾病，愈來愈多，有些根本無法治療，但是這絕不能否定病理學的研究價值。今天的重大關鍵在於國際政治學所提出的理論和事實之間，仍有很大的距離，因而使得它的效用性減低。不過，很客觀的說，這也是一般社會科學的普遍現象，我們不能期望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對於重大的通貨膨脹和社會不安等問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都能够對症下藥，而且藥到病除。雖然如此，社會科學家分析問題，和提供各種解決方法的努力，確是不能抹殺的。

很顯然的，今天的國際政治學已有其特殊的地位。在此情形之下，它是否能擺脫歷史、哲學、法律而成爲社會科學的單獨學門？由於國際政治學所要處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它必須與社會科學的每一分支學科保持密切的關係。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國際政治，確有幫助，不過正如後行爲主義所強調的，這種方法不能過度使用。歷史、哲學、法律畢竟是這個學科的基礎，無論它如何發展下去，這些都必須顧及。柯邊 (Alfred Cobban) 說過「政治缺少歷史無根，而歷史缺少政治無果」，這句話正是最好的說明。

敬請注意：

如蒙訂閱「問題與研究」月刊——

- (一) 國內：請到附近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填妥，連同訂閱費，劃撥三三六號本中心帳戶 (免付滙費)，當即照所指定之出版月份 (或卷期) 及收件人地址等寄奉刊物。
- (二) 國外：請將訂閱費利用美金支票或滙款繳付，并請指明從何時開始訂閱及收件人地址等，俾便辦理。所有繳付之訂閱費，均掣奉收據 (如指定收據抬頭，請說明)，以清手續。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敬啓